

新記大公報史稿

大公報館

大公報館

IMPARTIAL
大公報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一日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一日

本館開設大津法租界

STER GUARDIAN

武汉出版社 ● 吴廷俊 著

新记《大公报》史稿

吴廷俊 著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新记《大公报》史稿

吴廷俊著

*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

武汉市长江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5 印张 1 插页 字数 376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定价:15.00 元

*

ISBN7—5430—1288—X/G·439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序.....	(1)
绪论 一张文人办的报纸.....	(5)
一、《大公报》的来龙去脉	(6)
二、新记《大公报》的特殊历史地位	(17)
三、新记《大公报》的主要业务特色	(20)
四、研究新记《大公报》历史的意义	(28)

创业篇

送往迎来 《大公报》基奠津门

(1926. 9—1928. 9)

第一章 吴胡张天津相聚 《大公报》起死回生 (创业时期的事业发展)	(38)
一、新记公司成立	(38)
二、《大公报》续刊.....	(51)
三、从天津走向华北	(56)

第二章 顾名之戒说大公 新闻言论语惊世	
(创业时期的新闻与言论)	(63)
一、北伐武汉时期的新闻与言论	
(1926. 9—1927. 4)	(63)
二、蒋汪“清共”时期的新闻与言论	
(1927. 4—1927. 12)	(70)
三、北都易帜时期的新闻与言论	
(1928. 1—1928. 9)	(75)
第三章 社内社外结合 副刊专刊齐全	
(创业时期的副刊和专刊)	(86)
一、从《艺林》到《小公园》	(86)
二、专门性副刊渐齐	(90)
第四章 续刊二年信誉著 成功之本在“四不”	
(创业时期的办报主张)	(97)
一、为本报同人之志趣	(97)
二、为报界成熟之标志	(105)

发展篇

救亡图存 《大公报》业展全国

(1928. 9—1936. 9)

第五章 遭国难搬家增版 《大公报》南北刊行	
(发展时期的事业发展)	(110)
一、《大公报》发满一万号	(110)
二、从日租界搬至法租界	(114)

三、吴鼎昌辞去社长职·····	(118)
四、《大公报》涉足上海滩·····	(122)
五、《大公报》复刊十周年·····	(129)
第六章 时代风云多变幻 报道发言费考量	
(发展时期的新闻与言论)·····	(131)
一、新军阀混战时期的新闻与言论	
(1928. 9—1930. 11)·····	(131)
二、“围剿”与救亡时期的新闻与言论	
(1930. 11—1934. 12)·····	(139)
三、华北事变时期的新闻与言论	
(1935. 1—1936. 9)·····	(159)
第七章 为国事而创设 因形势而变化	
(发展时期的副刊和专刊)·····	(170)
一、好花合时而发·····	(170)
二、百花齐放斗艳·····	(185)
三、“李代桃僵”伴春·····	(187)
第八章 报纸言论应自由 新闻统制须合理	
(发展时期的办报主张)·····	(195)
一、“宽大取缔,有利政府”·····	(195)
二、“两姑之间难为妇”·····	(196)
三、关于国难中的“新闻统制”·····	(200)
第九章 替灾民乞赈 为伤员募金	
(发展时期的社会服务)·····	(205)
一、为陕灾赈款举行“宣传周”·····	(206)
二、为鄂皖水灾发起“救灾日”·····	(207)
三、为淞沪抗战募款·····	(210)
四、为榆关抗战募款·····	(211)
五、为江河水灾求赈·····	(211)

鼎盛篇

抗战救国 《大公报》名扬世界

(1936. 9—1945. 8)

第十章 为抗战辗转播迁 《大公报》事业鼎盛

- (鼎盛时期的事业发展) (214)
- 一、天津版毅然停刊..... (214)
- 二、汉口版艰难出报..... (215)
- 三、上海版誓不投降..... (222)
- 四、香港版创业南疆..... (227)
- 五、从武汉迁至重庆..... (231)
- 六、从香港撤到桂林..... (235)
- 七、荣获米苏里奖章..... (239)
- 八、总编辑张季鸾病逝..... (242)
- 九、董监事联合办事处成立..... (248)
- 十、《大公报》发满一万五千号 (252)

第十一章 倾一腔爱国热情 写千篇抗战文章

- (鼎盛时期的新闻与言论) (255)
- 一、西安事变时期的新闻与言论
(1936. 9—1937. 6) (255)
- 二、抗战全面爆发时期的新闻与言论
(1937. 6—1938. 10) (265)
- 三、抗战相持阶段的新闻与言论
(1938. 10—1941. 12) (282)

四、争取抗战胜利时期的新闻与言论

(1941. 12—1945. 8) (307)

第十二章 形式百种 主题一个

(鼎盛时期的副刊和专刊) (336)

一、《战线》上的战斗 (336)

二、在《文艺》战线上 (346)

三、多种多样的特刊 (358)

第十三章 办抗战报纸 做爱国报人

(鼎盛时期的办报主张) (360)

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办报宗旨 (360)

二、“国家忠卒、政府诤民”的言论责任 (365)

三、“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报人节操 (371)

第十四章 献绵薄之力 表赤诚之心

(鼎盛时期的社会服务) (375)

一、汉口馆主办“救伤义演” (375)

二、“大公报号”滑翔机 (377)

三、劳军募金与赈灾募捐 (379)

转折篇

两极难容 《大公报》根存港九

(1945. 8—1949. 6)

第十五章 抉择难左右不是 《大公报》四馆剩一

(转折时期的事业发展) (384)

一、“重来上海”	(384)
二、“重见北方父老”	(387)
三、总管理处在沪成立	(388)
四、《大公报》港版复刊	(393)
五、总经理胡政之病逝	(397)
六、《大公报》宣言新生	(398)
七、津、沪、渝三馆的变迁	(404)
第十六章 呼吁、警告，声嘶力竭 迷惘、烦闷，苦寻出路	
(转折时期的新闻与言论)	(417)
一、抗战胜利后的新闻与言论	
(1945. 8—1946. 6)	(417)
二、内战爆发时的新闻与言论	
(1946. 6—1948. 9)	(436)
三、两极决斗中的新闻与言论	
(1948. 9—1949. 6)	(453)
第十七章 “取消新闻检查 开放言论自由”	
(转折时期的办报主张)	(461)
一、“取消新闻检查 开放言论自由”	(461)
二、“在中国，民间报纸受歧遇”	(464)
三、中国报人之梦	(466)
后记	(469)

序

以“大公报”命名的报纸，在中国新闻史上先后有过七家。1902年始创于天津、目前还在香港继续出版的这一家，是硕果仅存的一家，也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家。

这家大公报，由地方报纸，发展成全国性的大报，全盛时期有天津、上海、重庆、香港等四个版，每日发行近20万份，不仅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新闻史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这家大公报还有很多值得重视的地方。

第一，它是近代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的一家中文报纸。从1902年创刊到现在，中间经过了英敛之、王郅隆、新记公司时期，宣布新生以后在天津、上海、北京等地出版的时期，以及作为爱国报纸在香港继续出版的时期，92年间累计已经发行了3万余号，至今还在继续出版。其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申、新两报，不久就要超过早已停刊的有101年历史的上海英文字林西报。后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寿命最长的一家报纸。

第二，它是一家以少数无党派的职业报人为核心创办起来的，以“文章报国”自诩，以“文人论政”为主要特征，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标榜的政治性大报。这是就1949年以前旧大公报的情况而言。所谓的“文人”不可能是没有倾向的，他们“论政”的立场，也不可能是超脱的。质言之，它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们论政的讲坛，所反映的也基本上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观点。

第三，它积聚了一批在旧中国有较大影响的新闻工作者。列入《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介绍”栏的大公报编辑记者，

累计达 36 人。被《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列为条目加以介绍的大公报编辑、记者达 12 人，占全部人物条目 108 条的 1/10 强。其中如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范长江、杨刚、子冈、徐盈、萧乾等，都有很大的知名度。被誉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的张季鸾，更享有很高的声望，“为士林所矜式”（以上引文均见张季鸾逝世时毛泽东、周恩来所发的唁电）。他们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也长期为人们所称道。

第四、它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在编辑工作上，社评、新闻通讯、新闻标题和星期论文，曾经被称为旧大公报的四大特色。它的各种副刊、专栏、专刊、特刊办得也很精彩，国际新闻报道、国外长篇通讯和国内旅游通讯，尤为读者所欢迎。这些，都曾经为同业所瞩目，成为学习的榜样。它的任人唯贤的一系列爱惜、培养和保护人才的人事制度，如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大胆放手使用人才，编辑记者定期互换，任命编辑记者担任经理等，以及它在经营管理上的一些成功经验，也为后来的同业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此外，它还获得过米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1941 年颁发的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并得到该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章。这是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美国的一所著名大学给予正在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斗争的一家亚洲国家报纸的最高荣誉。这件事曾经在当时中国的新闻界引起轰动，使大公报获得了很大的声望。

在历史上，这家报纸有功有过。功，表现在它支持戊戌前后的变法维新，要求慈禧归政，支持抵制美货，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军阀混战，较早地向中国读者报道革命后的苏联的情况，较早地介绍红军长征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支持学生运动，主张国共合作，要求言论自由，以及勇于揭露北洋政府及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丑恶，为人民说过一些公道话等方

面。过，表现在它在辛亥革命时期反对过暴力革命，在反帝问题上不够坚决，1928年以后，长期以蒋介石政权为正统，主张蒋对苏区的“围剿”，支持蒋的“安内攘外”政策，指责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期间拥护蒋的“国家中心”论，解放战争时期发表过《东北的阴云》、《可耻的长春之战》之类的袒蒋反共的社评等方面。在历史上的一些大的是非问题上，大公报的言论主张，瑕瑜互见，这其实也正是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面性的一种反映。

对于这样一份在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报纸，是应该花大力气进行深度研究的。遗憾的是，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建国以来的前三十年间，这方面的研究很不够。偶而看到一些有关它的回忆和评述性的文章，也是指责、贬抑和批判的居多，实事求是的、全面的介绍和评价较少。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大报，大公报和它所代表的这个阶级一样，有其两面性，即需要和赞成革命的一面，和怀疑及畏惧革命的一面。它的言论主张也自然有得有失，有功有过，但是功过不相掩。从整体上看，大公报功大于过。而且最后以自己的行动实现了立场的转变，完全站到人民的一边。对于这样一家报纸，过去的一些片面性的分析和评价，有很多是不够实事求是和不够公正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解放了思想，克服了“左”的影响，大公报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李纯青所写的《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徐铸成所写的《对大公报的几点个人看法》，李侠文、王文彬、张蓬舟、方蒙、何炳然、谢国明等人所写的有关大公报的文章，以及周雨著的《大公报史》，方蒙、谢国明合编的《大公报与现代中国》，徐铸成著的《报人张季鸾先生传》等，都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这些文章和专著都根据各自的理解，对大公报的历史和评价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吴廷俊同志的这部《新记〈大公报〉史稿》，是继上述那些文

章和专著之后，有关大公报研究的又一个新的成果。这部书着重叙述和评论的是1926至1949年新记公司时期的大公报的历史。全书以时代为经，以这一时期新记公司所属津沪汉渝港桂各版大公报的活动为纬，对这一时期大公报的政治倾向、言论主张、它与朝野各方面的关系、它的业务活动的特点以及它的是非功过，作了全面的深刻的剖析。作者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前者表现在他重视第一手资料的研究，不是想当然地凭印象说话，不人云亦云，力求做到言必有征，字字有出处有根据。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曾经用四年的时间，通读了新记公司时期几乎全部的大公报，作了详细的札记，订正了不少前人的文章和专著中的史实上的夺失。仅徐著《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一书，就被他订正了53处。后者表现在他力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一时期的大公报进行剖析，不掩过，不溢美，如实地评介其得失，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正因为这样，这部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它标志着有关大公报历史的研究，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对希望了解中国新闻史特别是大公报历史的读者来说，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大公报的性质，它的各个时期的政治倾向，言论主张，以及个别人物的评价，目前还有不同的看法，这些都是学术问题，可以通过争鸣的方式，互相沟通，逐渐得到认同。本书所阐述的某些观点，虽也只是一家之言，但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种一家之言越多越好。它将促进大公报史研究工作的开展，使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对此，我是乐观厥成的。

方汉奇

1994年7月于北京林园

注：方汉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

绪论 一张文人办的报纸

在世界报刊发展史上，主要有两种性质的报纸：一种是商人办的报纸，一种是党人办的报纸。商人办的多为商业性报纸，党人办的是多为政治性报纸；商业性报纸在经济浪潮中发展，政治性报纸在政治漩涡中沉浮；商人办报多念生意经，党人办报多算政治账；商人办报旨在营利，党人办报旨在营政。这是一般的情况。

也有特殊的，比如中国的《大公报》。它既不是党人办的报纸，又不是商人办的报纸，它是一张文人办的报纸。何谓文人办报？《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有一段很精彩、很精辟的话对此作了回答。他说：“中国素来做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商业性的，与政治没有关系，且以不问政治为标榜，专从生意经上打算；另一种是政治性的，自然与政治有了联系，为某党某派作宣传，但办报的人并不将报纸本身当作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目的达到了以后，报纸也就跟着衰歇了。但自从我们接办了大公报（指1926年9月1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成新记公司续刊大公报——引者注）之后，为中国报界开辟了一条新路径。我们的报纸与政治有联系，尤其是抗战一起，我们的报纸和国家的命运几乎联在一块，报纸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可谓达到极点。但同时我们把报纸当作营业做，并没有和实际政治发生分外的联系。我们的最高目的是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营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吃就算了事。这样努力一、二十年之后，使报纸真正代表国民说话。”^①简单地讲，文人办报就是：论政而不参政，经营不为营利，以言论报国，代民众讲话。

既非政治阶梯，亦非营利企业，是为文人论政的场所——这

就是新记《大公报》。

一、《大公报》的来龙去脉

在中国报刊史上，以《大公报》为报名的报纸，大约有7家，这里所讲的是1902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从创刊至今日，已有90多年的历史了。《大公报》近百年的历史，大致上分为四个时期：1902年—1916年为英敛之时期；1916年—1925年为王郅隆时期；1926年—1949年为新记公司时期；1949—现在为新生时期。

（一）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由英敛之创刊于天津。英敛之，名华，字敛之，又号安蹇，满州正红旗人，1867年生于北京。英出身寒微，幼年家贫，然刻苦自学，博览群书，愤世嫉俗，有正义感。他自己说：“迨弱冠前后，交结多穷苦无聊辈，酒酣耳热，相与抵掌谈天下事。遇奸贪误国、豪暴虐民诸行为，未尝不发指眦裂，痛恨唾骂为之结轸终宵也。”^②因而矢志终身不入仕途。感时忧国的英敛之在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和人生谛义的过程中，访遍了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于22岁时，笃信了天主教。

然而，教义并不能解决他在现实社会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面对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现实，在康、梁等人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呼声中，英敛之也萌发了维新思想。1898年4月，在维新运动的高潮岁月中，他撰写了《论兴利必先除弊》的文章，加入维新变法的行列。秋天，变法失败，英敛之恐被株连，逃出京城，至天津、上海，1900年3月到云南，担任法国驻蒙自领事馆馆员。因当地经常发生教案，7月英又随领事离开蒙自返回天津。此时的天津已被八国联军侵占，满目疮痍，英敛之工作无着只得又到上海，以教洋人学“官话”为生，1901年4月又北上天津。

机遇终于来了。英敛之此次回津，正碰上教友柴天宠集股开办报馆。柴天宠，字敷霖，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总管，初经营一家“天和号”，专售建筑材料，并承包各种建筑工程，由于承包天主教堂及教堂房产的工程发了财。英敛之回天津的第三天，即4月26日，便去看望柴天宠。两人谈及办报之事，十分投机。柴告知英，已集股本逾万元，拟邀英“主持其事”，要他大胆地干，“甘为赔垫”。英对此事当即应允。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创刊了。馆址在天津法租界狄总领事路（又名六号路乙，即现天津哈尔滨道42号），第一任主笔是汪康年推荐的方守六（亦作方漱六），经理、撰述、编辑等皆由英敛之一人兼顾。时风气未开，报馆设备简陋，初出一大张，成书本式，用中国毛边纸印刷，仅有一面。报头刊有法文：“L'Imparcial”，为“无私”之意。创刊号上刊登的署名“英华”的《大公报序》云：“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把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创刊之初，日销3800份。

《大公报》初为合股经营，然事业责任由英敛之负之。股东其大者除柴天宠外，主要还有粮商兼木厂捐客王郅隆、德商荣华洋行办买事务张连璧。其余股东多为天主教徒，樊主教（华名樊国栋）也入10股，另外，法国驻华领事馆的公使鲍渥也入了股（樊主教所入的10股是多少钱，公使入多少股多少钱，尚无可考）。还有，当时大名鼎鼎的维新派人士严复也入股千元。

由于馆址在法租界，股本中有洋股，因而经常受到来自法国人的压力与干扰。为了生存，《大公报》也不能不对法国人表示友好。1905年，英敛之访日后，法国人便收回了报馆租用的房子，这年9月5日，《大公报》搬至日租界旭街21号。

英敛之为长白志士，志在爱国，志在改良，在他亲自主持的10年中，《大公报》便形成了自己显著的特色，概括起来，主要有五：

其一是战斗性。《大公报》的传统是反腐败政治，反封建顽固派，敢于说话。在创刊的第二天，《大公报》就发表《大公报出版弁言》明确表示：“本报但循泰东西报馆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从此，《大公报》本着“知无不言”的原则，“以大公之心”，敢于揭露权贵，敢于为民请命，敢到老虎口边撩须，敢在慈禧头上动土。报史称，《大公报》自出版即负敢言之名，指责权贵，讥评地方，且不为威胁利诱所动摇。每每碰到关系国家大政方针的问题，英敛之和《大公报》都要站出来说话，通过发表“论说”来表明态度和观点。据何炳然先生统计，1902年，该报平均每月发表“论说”25篇，1905年平均每月22篇，1908年平均每月20篇，1909年和1910年，平均每月28篇，1911年前9个月平均每月26篇。^③《大公报》的论说不仅多，而且泼辣，责太后，斥权奸，骂官场，毫无惧色。创刊第5天，英敛之发表长篇论说《论归政之利》，矛头指向慈禧。如果说，《大公报》对慈禧还只是旁敲侧击的话，那么对刚毅、荣禄之流，更是毫不客气，动辄以“国贼”、“小人”相加。尤其对告密求荣的袁世凯，《大公报》与之针锋相对地斗争10年整，这在当时报界是独一无二的。

当然，由于英敛之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大公报》作为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言人，在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岁月，它的战斗性，是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的。《大公报》从创刊到辛亥革命的10年中，正是革命浪潮席卷中国、改良主义思想日趋衰落的时代，然而该报始终抱住维新改良思想不变，“敢言”而不忘“保皇”，反对封建专制而又不想彻底推翻它，鼓吹什么“立宪者，政体之完全无缺者也”；^④说什么“中国宜立宪不宜革命”。^⑤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方式上只想走改良道路，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上层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其二是通俗性。《大公报》的副刊文字多用京话甚至天津土话